

情感、理性、阶层身份： 多重机制下的集体行动参与

——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魏万青

内容提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集体行动的三个视角：情感、理性与阶层。基于情感视角，本文选取了不公待遇与总体不满意程度等与情感能量密切相关的变量，理性视角主要讨论国家与网络的作用，阶层视角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并运用CGSS2006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展开理论对话。研究发现：(1)与情感视角有关的变量，如，不公平待遇和总体不满意程度，都对个体集体行动参与以及参与程度有着显著影响。(2)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工具的单位制，受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其影响逐步弱化，无论是体制内单位，还是组织级别，都不能显著降低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即便如此，政府力量依然显著影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如果集体行动指向是针对国家(政府某项具体政策、某国家工作人员、政府)，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会显著降低。另外，个体网络也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3)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业主阶层以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更高，参与程度更深。

关键词：情感；理性；阶层身份；集体行动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社会学家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社会学研究长期集中在组织与分层的问题上，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属于这一范围)相对而言则受到了忽视”。^①近年来，关于集体行动与抗争的研究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围绕民众维权与社会抗争的研究日渐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学者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概念去表述该类行动，如“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②关于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构成了中国社会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机制研究”(13XJ C840002)。

作者简介：魏万青，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组织与治理问题。

众抗争研究的三条基本线索。^③其研究议题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各个方面。但总体上,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理论而展开,^④在方法上,部分研究缺乏必要的实证方法的支撑,“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理论加值型研究,仅仅用经验个案来证明单一理论的正确性,缺乏理论反思能力。就研究方法而言,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有研究在方法上较为单一:一是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二是个案分析多,比较研究少”。^⑤本文在梳理国内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集体行动的三个视角:情感、理性与阶层,并结合国内学者对集体行动关注的焦点,选取变量,对当下中国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当下我国集体行动是多重逻辑作用下的结果,并用全国性微观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二、研究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从阶层视角到情感、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兴盛年代”之前,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研究主要植根于某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关于集体行动的古典范式都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⑥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变量得到更多重视。现代化理论还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有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逐渐消失。李普塞特就将中产阶级称为社会的“稳定器”。^⑦由于古典范式(马克思和现代化理论)都强调阶层(阶级)的作用,因此也被学者称为阶层视角。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刺激了社会运动研究。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其代表理论家格尔、斯梅尔塞等人基本上继承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把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是非理性的,强调了不满情绪、怨恨等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斯梅尔塞认为社会不满是导致集体行为的直接原因。^⑧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这一过程被称为挫折—反抗机制。^⑨

第二代社会运动理论家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新一代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挫折—反抗”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社会运动,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合作的。在反思“挫折—攻击理论”的基础上,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其中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蒂利的研究中,关系网络、国家角色与行动者行动策略(斗争手法)得到更多的关注。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也强调国家的作用,关注在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中,国家会做什么,同时也关注行动者的斗争手法。后来,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理论。^⑩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斗争手法、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第二代理论引入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性选择理论范式下的资源动员

论与政治过程论已经在美国的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圈子里占有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视角下进行的。第一个范式是根植于经济学解释的古典主义视角,由于古典主义视角强调阶层(阶级)的作用,因此也被学者称为阶层视角。第二个范式也称为情感视角,强调认同及怨恨等情感逻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⑩⑪}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欧洲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影响下,开始关注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称为文化取向的社会运动理论。“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事实上,“文化的学者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可以将其归为一类。^⑫第三种视角是理性选择视角,其中的“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⑬三种研究视角,在理论上存在着传承关系,完全将其割裂开来是不科学的。在实践研究中,三种视角也是无法分开的,“多数的早期研究过于关注红卫兵运动,争论学生派别究竟是基于阶级背景还是政治网络”,然而研究中却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时间、同一场运动、同样的社会阶级中,也会出现多个非常不同的抗议活动类型。我们坚信这些不同的抗议类型要由不同的理论去解释”。^⑭

(二)国内研究关注重点

近年来,随着国内集体行动的增多,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集体行动。

首先是参与主体的研究。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构成了中国社会民众抗争研究的三条基本线索。近年来,城市业主集体行动的研究备受学者们关注,相对于其他群体,业主群体不仅在维权策略、维权工具上颇有特征,如更多的资源动员、对互联网等动员工具的运用等。更为重要的是,诸多学者相信,业主对自身房屋产权的维护和抗争是一个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⑮其本质而言是中产阶级缔造公民权的运动。^⑯一些学者更是将城市业主阶级视为中产阶级身份的主要标志。^⑰也正因为如此,在具体操作中,城市业主阶层,特别是“以新兴商品房住宅区和原城市中高档住宅区的业主、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主要代表。^⑱这些研究,对应的是现代化理论关于中产阶级稳定器假说,即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有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逐渐消失。在现实中,随着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张和影响力的渐增,考察他们的集体行动,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⑲

第二是参与原因的研究。由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矛盾冲突,集体行动中强烈的社会怨恨和过激行动的特点,使得早期研究强调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怨恨和被剥夺感。对心理变量或情感逻辑的关注,也成为集体抗争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取向。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指向两点:一是经历层面的,即怨恨或不满产生的源头,如某些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对地位变动和利益受损,以及与之伴随的相关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失当、不力或无能,^⑳如城市业主利益受损、民工欠薪、农民征地补偿过低等。二是结果层面的心理认知,如剥夺感、不满程度等,^㉑或因无能、腐败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等。^㉒

情感视角或心理学取向的集体行动研究对早期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集体行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不符合近年来集体行动组织化程度与理性能力的提升的现实。由此,研究者们将怨恨、不满程度等心理变量与政治机会结构和参与者理性能力融合在一起,发展了集体行动研究。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研究者特别关注制度背景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者指出,正是制度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着集体行动诉求的成功、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因此获得的利益与付出成本的大小。其中,中国城市的单位制特

征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单位制(他的研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对集体行动的抑制,“组织化依附”与“有原则的特殊主义”最大程度保持着单位对员工的控制力与员工的绝对服从。^④基于魏昂德的研究,冯仕政利用CGSS2003数据分析了单位性质、级别对集体行动的资源动员与政治过程机制的分割效应,研究发现,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单位对集体抗争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也指出,单位制本身也蕴藏着发生集体抗争的潜能。^⑤而田毅鹏等对东北地区H厂国企退休工人的集体行动研究发现,虽然“集体行动在单位武力保卫下平息”,但“集体意识在一次次的行动中不断瓦解”,单位共同体也逐渐走向裂变。^⑥与传统单位制相比,在社会剧烈转型中,单位制的控制力正逐步减弱。除关注制度背景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外,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蔡禾等人通过社会网络规模测量民工的资源动员能力,进而分析其对民工集体行动行为的影响。^⑦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关注集体行动策略、工具与互联网的影响。如黄晓星的研究,指出了业主们运用“间隙运用”策略达到抗争目的;^⑧黄荣贵、桂勇(2009)对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线业主论坛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⑨陈云松以CGSS2006数据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参与进行了实证研究。^⑩

(三)研究假设

总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参与主体(阶层身份)、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其中阶层身份研究又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参与。在综述国外社会运动理论与国内具体研究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拟从阶层身份、情感、理性三个角度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阶层视角:更关注身份认同,考虑到国内研究对中产阶级群体的关注,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身份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诸多研究指出,中产阶级是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将验证如下假设:相对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大,程度更高。在具体研究中,诸多研究者将业主视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本文首先验证以业主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集体行动参与假设:

假设1a:相对于非业主阶层,业主阶层参与集体行动。

然而,虽然学术界对中产阶级并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在具体研究中,仅以业主身份作为中产阶级身份标志,无疑太过简单。因此,有学者将城市商品房业主作为中产阶级代表时,使用“中产阶层”的概念,并特意提出特指其中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高的群体。^⑪因此,本文增加了个体的阶级认同作为关键变量,检验假设:

假设1b:相对于其他阶级身份认同的个体,认同自己为中产阶级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高,参与程度更深。

情感视角:强调认同及怨恨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认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负面情绪,如不满、疏离等是造成集体行为的核心机制。在现实中,不公平待遇激发个体不满情绪,一是结果层面的心理认知,如剥夺感、不满程度等。而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又与个体的不公平经历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

假设2a:对现实不满程度越高的个体,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假设2b:在现实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个体,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理性视角: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关注参与行动的收益与代价,关注网络与国家。政治机会主要与国家对相关集体行动的控制有关,也就是说行动对象会影响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在一个权威主义政体下,国家对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存在着较低的容忍度,因此,此类行动的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参与此类行动受到的惩罚或者付出的代价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国家机构会抑制此类行动,理

性个体对于此类行动的参与程度自然会降低,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相关假设:

假设 3a:如果集体行动指向国家(政府),个体参与该行动的可能性会降低,参与程度会降低。

正如前文综述所指出的,制度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着集体行动诉求的成功、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因此获得的利益与付出成本的大小。在我国,单位组织将国家命令性权力和资源交换性权力集于一身,中国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组织化形式和工具^⑧。其中,中国城市的单位制特征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因此,单位组织作为国家进行控制的组织化形式与工具,必然会对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组织的性质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程度,个体所在组织的国家控制力越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低,程度越低。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单位组织的影响——组织性质与组织级别,简单而言,相对于市场部门个体,体制内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如果失败,代价更高,甚至有可能导致失去体制内的工作。而个体所在组织级别越高,组织控制力更强,因此集体行动失败的风险更高,与之关联的是,所在组织级别越高,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资源越多,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如失败,成本也更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b:相对于体制外个体,体制内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低,参与程度更低。

假设 3c:个体所在组织级别越高,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低,参与程度越低。

理性选择范式下的集体行动理论不仅关注政治机会结构,关注国家对集体行动的态度,也关注参与者本身的资源,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具体体现在网络的规模上,网络规模越大,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资源动员能力可能越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3d:个体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越高。

上述几个假设,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影响个体集体行动的可能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本文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试图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尝试做出一个综合的解释。这些假设也包含着国内学者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一是谁在参与集体行动。这里主要关注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问题,中产阶级被视为社会稳定器,随着中国以城市商品房业主群体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这个群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方面的倾向如何?与其他群体相比较,是更高的参与风险,还是更低的参与风险?二是社会心理层面:不公正待遇、不满意程度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三是转型过程中的单位制的影响力问题:在急剧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单位制控制力是否显著减弱?

三、变量与测量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CGSS2006。该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样本涵盖我国大陆除青海、宁夏和西藏以外的28个省级单位。由于该数据为公开数据且在国内广泛使用,这里不多介绍。根据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的是过去五年身边曾发生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且年龄在60岁以下的个体进行分析。

(一)因变量

CGSS2006问卷中的问题E22:“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群体性的活动或行动,比如,联合抵制不合理收费、串联起来反对征地或拆迁、集体参加环保活动、集体签名、集体谈判、集体诉讼、集体请愿、集体上访、集体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请问,在过去五年中,您身边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把

这一问题看作本文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含义的理解(操作定义)。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和“参与程度”。

1. 是否参与:问题E24-E26分别问及如下问题:“您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或行动的酝酿过程(比如开会、讨论、联络等)?”“您是否为这些活动或行动提供过物质方面的支持(包括钱和物)?”“您是否通过签名、口头声援等方式对这些活动或行动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这三题中只要有一题回答为“是”,我们就编码为1,表示参与了集体行动,反之表示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编码为0。本文同样尝试了根据E23题(在行动中的角色)作为判定是否参加了该行动的依据。担任角色的作为参与组,反之为未参与组。后一种操作方法的统计结果见附录。

2. 参与程度:同样,我们根据问题E24-E26得到了个体参与程度的相关信息,我们将E24“您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或行动的酝酿过程(比如开会、讨论、联络等)?”、E25“您是否为这些活动或行动提供过物质方面的支持(包括钱和物)?”两个问题任意一项回答为“是”,即为“积极参与”,编码为2;如受访者表示仅“通过签名、口头声援等方式对这些活动或行动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E26),即为“一般参与”或“低度参与”,编码为1;上述问题都回答为“否”,则为“不参与”,编码为0。因此,参与程度从“不参与”到“积极参与”,分为三个层级。

(二)自变量

阶层身份:主要关注中产阶级阶层身份,根据有关信息,判断受访者是否是业主,本文将城市居民中,住房产权属于回答者“本人”、“配偶”以及“夫妻双方所有”的均视为业主阶层,其他家庭编码为非业主。

由于仅从住房产权区分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本文还考虑到受访者的阶层认同:即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进行判断(选项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其他阶级)。在编码处理中,本文以农民阶级为参照组,并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合并为中产阶级组。

不公平待遇:我们根据问卷中的半开放式问题E29“在过去的五年中,您是否在以下各方面的事情中遭受过不公平对待?”,得到受访者过去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信息。问题涉及“房产纠纷”、“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等各个方面,只要回答为“有”,就编码为1,反之编码为0。

不满程度:生活总体情况,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1-4分。

行动指向:根据问卷中问题E27:“这些活动或行动主要针对谁?”(复选),我们将回答为“国家有关部门”、“国家干部”、“国家某项政策”的,编码为1,表示集体行动指向国家,其他选项编码为0。

组织性质:我们将党政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编码为1,表示体制内单位。

组织级别:主要根据受访者所属组织情况,分为三组:高级别组,包括省市机关、省市以上级别的企业;低级别组,即市级以下单位;将体制外组织个体户等编码为无级别组。

网络规模:根据蔡禾、李超海关于网络规模的测量,这里我们同样选择的是受访者参与的社团数(参加的协会、社团、俱乐部或其他组织有多少个)。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地区、户口。其中个人收入我们纳入模型时取对数。另外,本文对集体行动与访问者本身的利益关系进行控制。该变量的操作来自问题E28:“这些活动或行动与您有无利害关系?”我们将回答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无关组”作为参照组进入模型。将回答为“会损害我的利益”的简称“负向利益组”。将回答为“会维护或增加我的利益”的简称“正向利益组”。

在CGSS2006数据中,共有1033个受访者表示过去五年身边曾发生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效样本数为992(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说明	全样本	N=922	未参与	N=672	参与	N=320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是否参与	1=是	0.323	0.468	-	-	-	-
参与程度	0=不参与,1=一般参与,2=积极参与	0.441	0.695	0	0	1.366	0.482
阶层身份	业主阶层=1	0.238	0.648	0.214	0.619	0.287	0.703
阶层认同	0=农民,1=工人,2=中产,3=其他	0.810	0.743	0.832	0.743	0.766	0.742
农民阶级		0.351	0.477	0.330	0.471	0.394	0.489
工人阶级		0.525	0.500	0.551	0.498	0.472	0.500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	0.0870	0.282	0.0760	0.265	0.109	0.313
其他阶级		0.0370	0.190	0.0430	0.203	0.025	0.156
不公待遇	1=有	0.358	0.480	0.265	0.442	0.553	0.498
不满程度	非常满意-非常不满意,1-4分	2.366	0.624	2.310	0.595	2.484	0.667
行动指向	国家或官员=1	0.556	0.497	0.582	0.494	0.503	0.501
组织性质	1=体制内	0.135	0.342	0.146	0.353	0.113	0.316
单位级别	0=无级别组,1=低级别组,2=高级组	1.116	1.345	1.171	1.355	1	1.318
网络规模	参与社团数	0.0490	0.289	0.0360	0.215	0.078	0.400
利益关系	0=负向利益组,1=无关组,2=正向利益组	1.195	0.568	1.116	0.448	1.359	0.734
负向组	与自身利益有害	0.0830	0.276	0.0490	0.216	0.153	0.361
无关组	对自身利益无关	0.640	0.480	0.786	0.411	0.334	0.473
正向组	对自身利益有益	0.277	0.448	0.165	0.372	0.512	0.501
年龄	年	39.18	11.00	38.91	10.92	39.74	11.15
性别	男=1	0.525	0.500	0.524	0.500	0.528	0.500
党员	党员=1	0.109	0.312	0.118	0.322	0.0910	0.288
教育	年	9.820	3.430	10.00	3.421	9.434	3.423
月收入	取对数	4.630	3.438	4.844	3.345	4.182	3.591
户籍	非农户籍=1	0.625	0.484	0.649	0.478	0.575	0.495
地区	1=东部,2=中部,3=西部	1.839	0.760	1.835	0.737	1.847	0.807
东部		0.382	0.486	0.368	0.482	0.412	0.493
中部		0.397	0.490	0.430	0.495	0.328	0.470
西部		0.221	0.415	0.202	0.402	0.259	0.439

从表1可知,集体行动指向国家、政府官员的比例较高,为55.6%。样本中,集体行动发生地区在东部地区的占38.2%、中部地区39.7%,西部地区为22.1%。另外,样本也反映出我国中产阶级比例较低,城市业主阶层仅为23.8%,认为自己为中产阶级身份的仅为8.7%。表1还根据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进行统计。参与样本中,中产阶级比例更高。从阶层身份看,参与样本中,业主阶层比例为28.7%,高于全样本的23.8%;从阶级认同来看,参与样本中,认同自己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的比例为11%,而全

样本中仅为8.7%。从不公平遭遇、不满意程度、参与社团数来看,表中参与样本也是略高于总样本。总样本中,有不公平遭遇的比例为35.8%,参与样本中为55.3%,差异非常显著。总体样本中,不满程度均值为2.366,参与样本中为2.48;参与社团数,总样本中为0.049,低于参与样本的0.078。从人口特征来看,参与样本与总样本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但在收入等方面差异较大。从表1可见,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中,与自身利益高度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参与组中,依然有33.4%的比例是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参与者。这反应出我国当下社会集体行动的复杂性:个体参加集体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利益因素驱动,许多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体也卷入了集体行动中,冲突目标泛化与模糊化,有导致冲突升级与破坏力增强的危险。

四、结果分析

(一)是否参与集体行动

表2报告了相关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logit回归结果。从模型1-8统计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比较稳定。具体而言,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以及党员身份影响均不显著。教育程度和利益关系的影响显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越低;从集体行动与个体利益关系来看,正向利益组和利益无关组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高于负向利益组。

表2 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N=992)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阶层身份	0.612**	0.634***	0.597**	0.526**	0.500*	0.512**	0.489*	0.502*
(业主=1)	(0.243)	(0.246)	(0.248)	(0.253)	(0.255)	(0.256)	(0.257)	(0.257)
阶级认同a								
工人阶级		-0.038	-0.021	-0.027	-0.078	-0.074	-0.048	-0.065
		(0.259)	(0.259)	(0.259)	(0.261)	(0.262)	(0.265)	(0.266)
中产阶级		1.020***	1.130***	1.161***	1.164***	1.156***	1.186***	1.135***
		(0.332)	(0.336)	(0.340)	(0.343)	(0.343)	(0.345)	(0.347)
其他阶级		-0.405	-0.477	-0.422	-0.391	-0.384	-0.375	-0.359
		(0.489)	(0.496)	(0.505)	(0.509)	(0.508)	(0.510)	(0.510)
不满程度			0.348***	0.271**	0.259**	0.261**	0.271**	0.276**
			(0.127)	(0.130)	(0.130)	(0.131)	(0.131)	(0.132)
不公待遇				0.764***	0.770***	0.772***	0.776***	0.776***
(有=1)				(0.168)	(0.169)	(0.170)	(0.170)	(0.170)
行动指向					-0.471***	-0.477***	-0.474***	-0.487***
(国家=1)					(0.163)	(0.163)	(0.163)	(0.163)
组织性质						0.187	0.236	0.225
(体制内=1)						(0.264)	(0.270)	(0.271)
组织级别b								
低级别组							-0.240	-0.226

(续表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0.273)	(0.274)
高级别组							-0.093	-0.078
							(0.236)	(0.236)
社团数								0.475*
								(0.282)
年龄	0.001	0.002	0.003	0.000	0.001	0.000	0.001	0.002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9)	(0.009)
男性	0.025	0.002	-0.014	-0.007	0.006	0.000	-0.001	0.001
	(0.159)	(0.161)	(0.162)	(0.164)	(0.165)	(0.165)	(0.165)	(0.165)
党员	0.016	-0.007	0.040	0.046	0.058	0.022	0.048	0.025
	(0.275)	(0.278)	(0.280)	(0.284)	(0.284)	(0.288)	(0.289)	(0.291)
教育	0.027	0.016	0.019	0.032	0.034	0.029	0.030	0.029
	(0.029)	(0.030)	(0.030)	(0.030)	(0.031)	(0.031)	(0.031)	(0.031)
收入	-0.051**	-0.052**	-0.046*	-0.046*	-0.048*	-0.049**	-0.047*	-0.046*
	(0.024)	(0.024)	(0.025)	(0.025)	(0.025)	(0.025)	(0.025)	(0.026)
利益关系 c								
无关组	-1.960***	-2.026***	-2.030***	-1.774***	-1.817***	-1.823***	-1.838***	-1.817***
	(0.258)	(0.260)	(0.262)	(0.268)	(0.271)	(0.271)	(0.272)	(0.273)
正向利益组	0.111	0.141	0.074	0.187	0.163	0.171	0.159	0.174
	(0.263)	(0.264)	(0.267)	(0.271)	(0.273)	(0.273)	(0.274)	(0.274)
地区 d								
中部地区	-0.329*	-0.326*	-0.359**	-0.341*	-0.316*	-0.317*	-0.310*	-0.314*
	(0.177)	(0.179)	(0.180)	(0.182)	(0.183)	(0.183)	(0.185)	(0.185)
西部地区	0.301	0.293	0.300	0.314	0.335	0.315	0.330	0.320
	(0.201)	(0.203)	(0.203)	(0.206)	(0.207)	(0.209)	(0.211)	(0.212)
户籍	-0.242	-0.259	-0.341	-0.382	-0.424	-0.430	-0.384	-0.390
(城市=1)	(0.194)	(0.258)	(0.260)	(0.261)	(0.263)	(0.263)	(0.270)	(0.270)
截距	0.365	0.427	-0.423	0.050	0.361	0.421	0.374	0.321
	(0.516)	(0.519)	(0.607)	(0.627)	(0.639)	(0.645)	(0.659)	(0.659)
Log lik	-517.0	-508.8	-505.1	-494.9	-490.6	-490.4	-490.0	-488.5

注:1.显著度:*** p<0.01, ** p<0.05, * p<0.1。2.参照组:a-阶级认同为农民阶级,b-组织级别为无级别组,c-利益关系为利益有害组,d-地区为东部地区。

关于阶层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身份与认同对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该部分主要讨论业主身份与阶层身份认同。模型1中控制了年龄、性别、党员身份、教育以及利益关系外,添加了关键变量业主身份,比较城市业主与非业主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检验假设1a。统计结果显示,城市业主阶层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高于非业主阶层(系数为0.61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假设1a得到支持。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仅以业主身份界定中产阶级过于简单,因此,笔者在模型2中增加了阶层身份认

同变量。模型2统计结果显示,认同自身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高于认同为其他阶级的个体(回归系数为1.020,在1%水平上显著),也显著高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text{test } b_{\text{中产}}=b_{\text{工人}}, \chi^2=14.94, p=0.0001$),假设1b得到验证。总体而言,从中产阶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来看,国内学者关于中产阶级因为权利意识更强、维权意向与参与集体行动可能性更高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为检验假设2a,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对总体状况的不满意程度。结果显示,个体不满意程度回归系数为0.348,在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个体不满意程度每提高一个度量单位,相应的发生比比原来提高了41% $[\exp(b)-1=0.41]$,影响非常显著,假设2a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为检验假设1b,模型4添加了关键变量不公平待遇。统计结果显示,假设1b得到数据的支持(相应系数为0.764),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过去五年有不公平待遇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是过去五年无不平等待遇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的2.138倍。可见,不公平遭遇是导致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

模型5-8主要检验理性范式相关假设,即假设3。模型5统计结果显示,集体行动指向目标影响十分显著。当集体行动指向某政府机构、政策或者公职人员时,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降低了。正如前文所述,权威主义政体对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的容忍度较低,这意味着参与此类行动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但受到的惩罚或者付出的代价相对较高,理性个体会降低对该类集体行动的参与,假设3a得到支持。

长期以来,单位制被视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控制的基本工具,因此,体制内就业个体受到国家的影响显著高于市场组织内个体。模型6中新增变量组织性质(是否体制内)。然而,统计结果显示体制内组与非体制内组,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并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结果甚至显示出体制内组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要高于非体制内组,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但与理论预期方向相反。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引发工人群众集体抗议事件,这些工人都属于体制内人员,从而导致体制内参与概率更高。这也可能与本文操作化有关:在本文变量操作时,将单位视为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忽略了中国单位制改革所造成的大量下岗、倒闭、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一波重要的城市集体行动。^③但无论哪种结果,均显示在转型时期,单位控制力逐步弱化的现实。同样的情形还体现在组织的行政级别变量上。模型7增加了组织行政级别变量,检验组织级别对集体行动控制的影响。组织级别影响不显著,虽然有组织级别组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要低于无级别组,但在统计意义上,其差别并不显著。

模型8主要检验假设3d,即社会网络资本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与其参加集体行动的概率正相关,个体参与社团数的回归系数为0.47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参与程度

为反映各影响因素对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影响,我们采用ologit模型进行回归,统计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总体而言,表3报告统计结果与表2反映的趋势相同,这反映出模型的稳健性。

首先是关于中产阶级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相关假设的检验。阶层身份与阶层认同相关假设在模型1、模型2统计结果中得到很好的支持。相对于非业主阶层,业主阶层卷入集体行动的程度更高。阶层认同方面,相对于其他阶层身份认同(其他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个体,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企业主阶级的个体其卷入集体行动的程度更高。

与表2一样,模型3和模型4主要对情感范式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假设2),模型3统计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假设2b,反映出个体卷入集体行动的程度与其总体不满意程度显著相关。模型4结果显示,过去五年

有不公平待遇的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程度要显著高于过去无不公平待遇遭遇的个体,与理论预期结果相符。

表3 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ologit回归结果(N=992)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阶层身份	0.635***	0.650***	0.602***	0.514**	0.488**	0.498**	0.474**	0.493**
(业主=1)	(0.226)	(0.228)	(0.229)	(0.233)	(0.234)	(0.235)	(0.235)	(0.236)
阶级认同a								
工人阶级		-0.148	-0.125	-0.169	-0.233	-0.230	-0.191	-0.207
		(0.244)	(0.245)	(0.245)	(0.246)	(0.247)	(0.250)	(0.250)
中产阶级		0.888***	0.989***	0.994***	0.985***	0.971***	1.005***	0.942***
		(0.311)	(0.314)	(0.316)	(0.319)	(0.320)	(0.322)	(0.323)
其他阶级		-0.506	-0.573	-0.548	-0.534	-0.531	-0.521	-0.502
		(0.476)	(0.480)	(0.487)	(0.491)	(0.491)	(0.492)	(0.492)
不满程度			0.308**	0.220*	0.206*	0.207*	0.223*	0.217*
			(0.120)	(0.122)	(0.122)	(0.123)	(0.124)	(0.123)
不公待遇				0.795***	0.809***	0.812***	0.812***	0.809***
(有=1)				(0.159)	(0.160)	(0.160)	(0.161)	(0.161)
行动指向					-0.490***	-0.498***	-0.495***	-0.507***
(国家=1)					(0.152)	(0.153)	(0.153)	(0.153)
组织性质						0.211	0.278	0.259
(体制内=1)						(0.247)	(0.255)	(0.255)
组织级别b								
低级别组							-0.277	-0.266
							(0.260)	(0.261)
高级别组							-0.185	-0.166
							(0.221)	(0.222)
社团数								0.465*
								(0.243)
其他控制变量c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Log lik	-720.9	-712.4	-709.1	-696.7	-691.5	-691.1	-690.5	-688.7

注:1.显著度:***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尾检验)。2.参照组:a-组织级别为无级别组,b-阶层身份为非业主阶层。3.c-其他控制变量相关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模型5-8检验了理性范式有关假设。模型5统计结果显示,集体行动的目标指向显著地影响个体卷入集体行动的程度,权威主义国家对指向国家的集体行动容忍度较低,意味着参与该类型集体行动失败的可能性与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理性个体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其卷入程度更低。模型6、模型7检验了单位制的影响。总体而言,统计结果反映出当下中国单位制控制力下降的趋势。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

不显著,但数据反映出的趋势与理论预期相反,体制内个体参与程度甚至高于体制外个体。单位级别对抑制集体行动参与有一定影响,与理论预期相符,但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推论到样本之外要更慎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单位制影响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文在理论与操作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假设3b与假设3c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模型8中,我们同样以个体参与社团数反映个体社会网络资本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个体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卷入集体行动的程度越高。

五、相关讨论与结论

(一)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显著,各种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西方社会学家对集体行动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我们研究集体行动提供诸多启发。

本文在梳理西方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集体行动的三个视角:阶层、情感与理性。基于阶层视角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研究发现,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业主阶层以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更高,参与程度更深。在以往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农民、工人与中产阶级构成了参与的三个主要群体,然而,本文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高于农民与工人阶级群体。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伴随着自身的权利诉求,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积极回应,使得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出现的集体行动成为社会减压阀,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基于情感视角,本文分析了不公待遇与总体不满意程度等与情感能量密切相关的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公平待遇是促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同时,总体不满意程度对促进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及参与程度有着显著影响。理性视角主要讨论国家(单位制)与网络的作用。研究发现: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工具的单位制,受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其影响逐步弱化,无论是体制内单位,还是组织级别,都不能显著降低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即便如此,政府力量依然显著影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如果集体行动指向是针对国家(政府某项具体政策、某国家工作人员、政府),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会显著降低。另外,个体网络也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以及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

(二)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特点与建议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是社会冲突的突发期,中国无疑正在进入这一时期。目前,我国社会集体行动事件体现出复杂性特点:一是无直接利益的参与者与情感能量升级。诸多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卷入集体行动,使得集体行动缺乏明确冲突目标,破坏性升级,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二是传统社会控制手段逐步减弱而主要靠国家直接介入,以政府权威、信用为背书。研究显示,传统单位制、单位级别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逐步弱化了,也意味着控制集体行动的手段逐步刚化缺少柔性。三是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

诸多利益无关群体卷入因利益冲突而起的集体行动,使得集体行动缺乏明确冲突目标,破坏性升级;单位制等传统控制手段的弱化,使得国家应付集体行动的手段缺少柔性,影响政府权威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及其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意味着如果没有合理引导,集体行动会逐步增

加。应该如何面对日益增多的集体行动事件?从社会转型经验来看,社会冲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低烈度的冲突属于社会正常现象,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需要防止的是破坏性大的、蕴含巨大情感能量的集体行动。欧美社会转型经验特别是美国进步时代经验显示,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必然带来社会治理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在于社会建设,特别是“民情”建设,而在社会建设中,中产阶级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一,中产阶级兴起,社会结构从“倒金字塔”、“倒丁字形”走向“纺锤型”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其二,社会建设的和谐推进需要发挥中产阶级作用。通过中产阶级引导的社会组织——理性化的社会组织而非底层聚集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民众权利诉求的理性化与“去民粹化”。而倡导理性、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社会理性化、“去民粹化”的必要条件。^②与此同时,还需要政府加强制度建设与再造,及时回应社会诉求,包容性发展。^③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进行的200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6)。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当然,文责自负。感谢评审老师,单位制影响与预期不相符,也与本文操作化有关,需更多信息对此展开深入分析。

注释:

①⑬⑭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5(1)。

②③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③陈鹏:《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载《开放时代》,2009(4)。

④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⑤李德满:《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载《社会》,2009(6)。

⑥⑮裴宜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4)。

⑦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⑧Smelser, Neil J.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⑨Gurr, Ted 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⑩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⑪陈硕、吴毅:《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载《社会》,2014(1)。

⑫⑯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载《开放时代》,2004(4)。

⑬沈原:《走向公民权——业主维权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公民运动》,载《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⑭孟伟:《建构公民政治:业主集体行动策略及其逻辑》,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⑮朱健刚:《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载《社会》,2011(3)。

⑯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载《社会学研究》,2006(4)。

⑰杨晓虎、傅菊辉:《当前我国中产阶层集体政治行动审视》,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1)。

⑱⑲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1)。

⑳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载《社会学研究》,2007(3)。

㉑Walder A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㉒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载《社会学研究》,2006(3)。

- ②田毅鹏、陶宇:《“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载《学术研究》,2011(2)。
 ②⑧黄晓星:《“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12(1)。
 ②⑨⑩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5)。
 ③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载《社会》,2013(5)。
 ④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1)。
 ④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⑤马骏、刘亚平:《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附录 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根据E23编码的结果,N=978)

变量	模型1	模型2 ¹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阶层身份	0.549**	0.569**	0.539*	0.474*	0.447	0.476*	0.408	0.436
(业主=1)	(0.274)	(0.276)	(0.278)	(0.281)	(0.284)	(0.285)	(0.286)	(0.287)
阶级认同 ^a								
工人阶级		0.174	0.189	0.170	0.094	0.099	0.194	0.168
		(0.290)	(0.290)	(0.290)	(0.293)	(0.294)	(0.300)	(0.302)
中产阶级		1.099***	1.165***	1.164***	1.148***	1.131***	1.225***	1.133***
		(0.375)	(0.380)	(0.382)	(0.388)	(0.389)	(0.396)	(0.400)
其他阶级		-0.689	-0.740	-0.736	-0.724	-0.700	-0.712	-0.680
		(0.622)	(0.627)	(0.633)	(0.634)	(0.633)	(0.640)	(0.641)
不满程度			0.216	0.146	0.136	0.137	0.177	0.188
			(0.140)	(0.142)	(0.143)	(0.144)	(0.146)	(0.146)
不公待遇				0.627***	0.636***	0.637***	0.660***	0.654***
(有=1)				(0.188)	(0.189)	(0.190)	(0.191)	(0.192)
行动指向					-0.566***	-0.587***	-0.585***	-0.613***
(国家=1)					(0.184)	(0.185)	(0.186)	(0.187)
组织性质						0.473	0.649**	0.637**
(体制内=1)						(0.302)	(0.311)	(0.313)
组织级别 ^b								
低级别组							-0.779**	-0.756**
							(0.322)	(0.324)
高级别组							-0.357	-0.328
							(0.268)	(0.269)
社团数								0.731**
								(0.292)
其他控制变量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同表2
截距	0.189	0.248	-0.291	0.131	0.490	0.642	0.476	0.393
	(0.564)	(0.567)	(0.668)	(0.688)	(0.702)	(0.711)	(0.726)	(0.728)
Log lik	-418.7	-412.4	-411.2	-405.6	-400.9	-399.7	-396.6	-393.2

注:1.显著度:*** p<0.01, ** p<0.05, * p<0.1。2.参照组:阶级认同a-农民阶级,组织级别b-无级别组,利益关系c-利益有害组,地区d-东部地区。3.其他控制变量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motion, Rational Choice, Class Identity: Multiple Mechanism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06

WEI Wan-q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China. Then, it proposes three broad perspective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collective action or group events: perspectives of class identity, emotional or rational choic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unfair treatment and overall dissatisfaction with emotional energy to stand for the emotional force, and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the social network to test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 also focus on participation of middle clas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employs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06 to verify how the emotional, rational, and class status influence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found: (1) Those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emotional perspective, including the unfair treatment experience, individual's dissatisfac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her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2) Danwei, used to be State-controlled social tool, its control is eroding because of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However, government forces st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dividual's participation. If actions ar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specific policy, government officer, the government), the prob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participate in will be significantly lower. (3)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the middle clas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with a higher possibility and greater depth.

Key words: emotion; rational choice; class identity; collective action

(责任编辑:李丁)